

利瑪竇世界地圖研究百年回顧

龔纓晏*

摘要 一個世紀前，西方學者率先發起了對利瑪竇世界地圖的研究，並且長期主導這個學術領域。自二十世紀中期開始，日本學者就和西方學者一起，共同構成了推動這項研究的兩大力量。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開始，中國學者在利瑪竇世界地圖的研究中不斷取得原始性成果，從而受到了國際學術界的高度重視。今天，在對利瑪竇世界地圖的研究中，已形成中國學者、日本學者、西方學者三足鼎立之勢。經過國際學術界一百多年的努力，相關研究不再停留在簡單、宏觀、粗疏的層次上，而是達到了較高的學術水平。在此背景下，只有繼續加強國際合作，才能破解目前所面臨的高難度學術問題。

關鍵詞 利瑪竇；《坤輿萬國全圖》；《兩儀玄覽圖》；中西文化交流；古地圖

利瑪竇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偉人，他在中國繪製的世界地圖，是東西方共同的文化遺產。在過去的一個多世紀中，國際學術界對利瑪竇世界地圖進行了廣泛的研究，並且取得了豐碩的成果。為了進一步深化相關研究，本文對百年來的研究歷程作一回顧，從而為今後的研究提供可靠的學術基礎。

早在十九世紀末，歐洲已有人開始關注利瑪竇世界地圖，並且根據相關文字記載來進行推測。1874年，英國學者玉爾（Henry Yule）認為，利瑪竇的世界地圖，應當是用透視投影法（Perspective Projection）繪製的東西兩半球圖。他還據此繪製出了一幅利瑪竇世界地圖的復原圖，並且說：“利瑪竇世界地圖的投影一定與此差不多”。¹對照後來發現的利瑪竇世界地圖，可以知道，玉爾的“復原圖”完全是錯誤的。

1904年，日本京都帝國大學（今京都大

學）從伊勢松阪的一位商人手中購獲一幅利瑪竇《坤輿萬國全圖》，並向公眾展示。1905年，青楓生在日本《歷史地理》上連續發表兩篇文章，²對這幅《坤輿萬國全圖》進行開創性的討論。

1910年，意大利米蘭的安布洛茲圖書館（Ambrosiana Library）發現一幅中文《萬國全圖》。許多學者曾認為，這幅地圖就是利瑪竇於1584年繪製的世界地圖，利奧·巴格羅（Leo Bagrow）在其名作《地圖學史》（*History of Cartography*）中也接受了這樣的說法，在1985年版中還沒有改過來。³而實際上，這幅地圖並非利瑪竇的作品，而是艾儒略繪製的。⁴

1911年，汾屠立（Pietro Tacchi Venturi）整理出了利瑪竇的意大利文手稿，以《耶穌會士利瑪竇神父歷史著作集》（*Opere Storiche del P. Matteo Ricci S.I.*）出版。這部在利瑪竇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著作，不僅提供了關於利瑪竇在中國繪製世界地圖的基本史料，而且，還公佈了梵蒂岡教廷圖書館（Biblioteca Apostolica Vaticana）所藏《坤輿萬國全圖》的一部分。

* 龔纓晏：歷史學博士，寧波大學教授，浙江大學博士生導師，中國海外交通史研究會副會長，主要從事中外關係史、古地圖研究。

1917年，英國學者巴德雷（J. F. Baddeley）在英國皇家地理學會發現了一幅利瑪竇《坤輿萬國全圖》，並且發表了題為《利瑪竇神父的中文世界地圖（1584—1603年）》（*Father Matteo Ricci's Chinese World Map, 1584-1603*）的開拓性文章。⁵ 巴德雷把英國皇家地理學會的《坤輿萬國全圖》與安布洛茲圖書館及梵蒂岡教廷圖書館發現的中文世界地圖進行了比較，進而探討了利瑪竇在中國繪製世界地圖的過程、利瑪竇世界地圖的西文資料來源等問題，從而正式開啟了對利瑪竇世界地圖的學術研究。在巴德雷這篇論文後面，還附有希伍德（E. Heawood）撰寫的《利瑪竇所繪諸地圖之間的關係》（*The Relationships of the Ricci Maps*）一文。⁶ 此文主要從西方製圖學史的角度，對利瑪竇世界地圖的西文資料來源問題進行了初步探討。

1918年，英國漢學家翟林奈（Lionel Giles）將英國皇家學會所藏《坤輿萬國全圖》上的主要文字譯成英文發表，⁷ 同時也取得了以下這些進展：一、指出皇家地理學會藏本中“總論橫度里分”表上的四處錯誤；二、指出皇家地理學會藏本上的“明”字被改作“清”字，因而此圖應是清初所印，它與梵蒂岡教廷圖書館藏本不屬同一版本；三、指出安布洛茲圖書館所藏《萬國全圖》不同於《坤輿萬國全圖》，因而不可能是利瑪竇所作；四、通過研究《坤輿萬國全圖》上的一些地名來源，探討利瑪竇世界地圖的西文資料來源問題。

1936年，中國禹貢學會出版的《禹貢》第五卷第三、四期合刊為“利瑪竇世界地圖專號”。在該專號中，發表了洪煨蓮（洪業）、陳觀勝、顧頡剛、童書業、賀昌群、朱士嘉等人的文章，使國際學術界終於聽到中國學者發出的強有力的聲音。其中洪煨蓮所撰《考利瑪竇的世界地圖》一文最具開拓意義。此文根據中文史料，對利瑪竇世界地圖上的相關內容進行了扎實的考證，取得了許多突破性進展，從而成為學術史上的一篇經典之作。

也是在1936年，日本的鮎沢信太郎從朝鮮留日學生黃炳仁處見到《兩儀玄覽圖》，並且發表了《關於利瑪竇的〈兩儀玄覽圖〉》⁸ 等文章，將這幅前所未有的利瑪竇世界地圖公諸於世，從而為進一步研究利瑪竇世界地圖提供了新的資料。

1938年，德禮賢（Pasquale M. D. Elia, 1890-1963）的意大利文巨著《利瑪竇神父的中文世界地圖》（*Il Mappamondo Cinese del P. Matteo Ricci*）出版。此書以梵蒂岡教廷圖書館所藏《坤輿萬國全圖》為底本，根據大量的中文和西文文獻，對利瑪竇世界地圖進行了全面的研究。德禮賢的這部《利瑪竇神父的中文世界地圖》，是利瑪竇世界地圖研究史上的一座豐碑。1961年，德禮賢發表了又一力作《新近發現的利瑪竇世界地圖》[*Recent Discoveries and New Studies on the World Map in Chinese of Father Matteo Ricci (1938-1960)*]。這篇文章，主要討論朝鮮黃炳仁家藏傳世的《兩儀玄覽圖》，同時也對相關的其他一些問題進行了探討。德禮賢的這篇《新近發現的利瑪竇世界地圖》，可以說是《利瑪竇神父的中文世界地圖》一書的補充，兩者共同構成了關於利瑪竇世界地圖的一個完整的研究成果。

德禮賢在《新近發現的利瑪竇世界地圖》所探討的朝鮮黃炳仁家藏傳世的《兩儀玄覽圖》，收藏於韓國崇實大學基督教博物館中。在烽火連天的朝鮮戰爭中，該博物館創始人金良善“冒着彈雨回到博物館”，把這幅世界珍寶深埋於地下，最終幸運地將其保存下來了。⁹ 金良善還是韓國研究利瑪竇世界地圖的拓荒者。1961年，他發表文章，首次刊佈了《兩儀全覽圖》上的中文序跋題識。1988年，崇實大學基督教博物館公佈了該館所藏利瑪竇《兩儀玄覽圖》的完整印本。¹⁰ 二十世紀中期，在研究利瑪竇世界地圖的中國學者中，在台灣生活的方豪當推首位。他除了在一系列論著中對利瑪

中西交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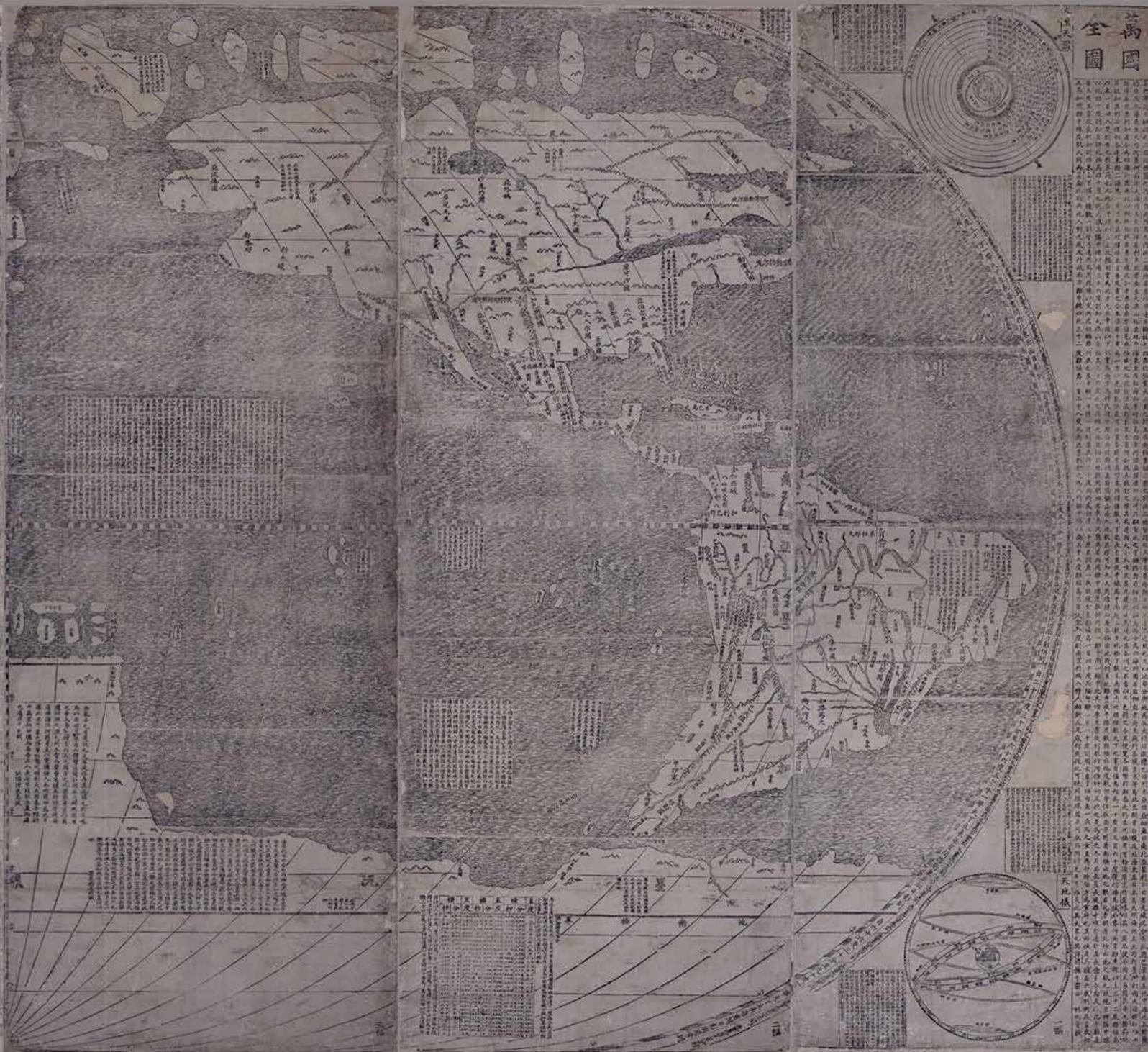


圖 1. 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藏《坤輿萬國全圖》（圖片來源：京都大學貴重資料デジタルアーカイブ：<https://rmda.kulib.kyoto-u.ac.jp/item/rb00013547#c=0&m=0&s=0&cv=1&r=0&xywh=-3173%2C-836%2C19716%2C14888>）

中西交流

竇及其世界地圖加以論述，還與德禮賢等人進行通信討論。他曾指出德禮賢在整理利瑪竇世界地圖時所依據的奧特里烏斯世界地圖，實際上是1595年版，而非像德禮賢自己所說的那樣是1570年版。¹¹他在《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的“李應試”等相關人物的傳記中，對《兩儀玄覽圖》上的一些人物進行了考訂，同時指出德禮賢1961年《新近發現的利瑪竇世界地圖》一文中的一些錯誤。他的《李之藻研究》等論著，為研究利瑪竇世界地圖提供了許多資料及文獻線索。

1970年，船越昭生發表題為《坤輿萬國全圖與鎖國日本》的長篇論文，根據新發現的資料再次對利瑪竇世界地圖的繪製過程進行全面考察，並特別討論了利瑪竇世界地圖對日本的影響。作者還將所能搜集到的利瑪竇世界地圖的刻本與摹本一一刊出，雖然細節部分無法看清，但為其他研究者提供了利瑪竇世界地圖的基本圖像。船越昭生後來又發表《利瑪竇世界地圖在朝鮮的影響》一文，進一步深化對此問題的研究。

在此時期，韓國學者也繼續開展關於利瑪竇世界地圖的研究。1969年，盧禎植發表了《〈芝峰類說〉地理學內容的研究》。該文以古代朝鮮學者李晬光（1563—1629）的《芝峰類說》為主要依據，比較全面地探討了利瑪竇世界地圖在朝鮮半島的傳播及其影響。¹²1976年，張寶雄根據中國、日本、韓國以及部分西方學者的研究成果，考察了利瑪竇世界地圖的繪製過程及版本情況，同時也簡要分析了利瑪竇世界地圖對朝鮮半島的影響。¹³

進入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國學者在利瑪竇世界地圖的研究上再次活躍起來，這主要歸功於遼寧省博物館所藏《兩儀玄覽圖》的發現和刊佈。1981年，王綿厚首次介紹了保存在遼寧省博物館中的《兩儀玄覽圖》，¹⁴此後，他又發表幾篇文章。1983年，曹婉如等人對保存在中國的利瑪竇世界地圖做了綜合論述，並且就一些難點提出了見解。¹⁵1995年出版的《中

國古代地圖集》（明代），不僅收入了南京博物院所藏彩色摹繪本《坤輿萬國全圖》，而且還首次刊佈遼寧省博物館所藏的《兩儀玄覽圖》及圖上的序跋題識文字。

1986年，德伯格（Minako Debergh）對1708年朝鮮人摹繪的彩繪本《坤輿萬國全圖》（即日本大阪芳郎氏藏本）進行了專題研究。這篇文章將該藏本上朝鮮人所作的序文作了考訂，並且譯成了法文，同時就彩繪本利瑪竇世界地圖的來源問題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¹⁶

1986年，日本學者川村博忠在奧地利訪學期間，對奧地利國家圖書館（Österreichische Nationalbibliothek）所收藏的利瑪竇《坤輿萬國全圖》進行了考察。1987年，川村博忠再次來到奧地利國家圖書館，專門查證這幅《坤輿萬國全圖》上的“總論橫度里分”上的細節。川村博忠認為，在明朝，《坤輿萬國全圖》除了李之藻原刻本外，還有工人私刻本等其他刻本，奧地利國家圖書館所藏《坤輿萬國全圖》應當就是工人私刻本。與李之藻原刻本相比，奧地利國家圖書館藏本的特點是，“總論橫度里分”表上有四處錯誤；地圖上本來刻有“大明一統”四字，清朝建立後，其中的“明”字用毛筆被改寫成“清”字；但奧地利國家圖書館藏本又不同於英國皇家地理學會藏本，例如，奧地利國家圖書館藏本與李之藻原刻本一樣，都有“大明聲名”幾個字，而英國皇家地理學會藏本則將其改為“中國聲名”；英國皇家地理學會藏本上有正確的“尺寸”兩字，而奧地利國家圖書館藏本則將其誤作為“尺十”，等等。因此，英國皇家地理學會藏本應當是清代的刻本。此外，在川村博忠看來，英國皇家地理學會藏本的地圖名稱《城輿萬國全圖》，是刻工在雕刻時的一個錯誤，也就是說，在地圖的刻版上就已將“坤”字誤刻為“城”字。¹⁷川村博忠的這篇文章，對於認識利瑪竇《坤輿萬國全圖》的多種刻本，提供了有力的證據。

1995年，約翰·戴（John Day）在一篇長

文中，刊佈了美國凱達爾捕鯨博物館 (Kendall Whaling Museum) 新入藏的一條彩繪本《坤輿萬國全圖》殘屏，並且通過與其他已知利瑪竇世界地圖進行比較，重點探討了彩繪本《坤輿萬國全圖》的來源問題，並且提出了許多新見解。¹⁸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日本女學者青木千枝子 (1926—1996) 發表一系列文章，重點探討了利瑪竇《坤輿萬國全圖》在日本的收藏情況、日本人摹繪的《坤輿萬國全圖》的譜系及特色。特別是，她通過仔細比較，發現目前存世的1602年《坤輿萬國全圖》刻本與日本人摹繪本之間存在着幾處明顯的差異，例如《坤輿萬國全圖》刻本“九重天圖”上的“第八重二十八宿天四萬九千年作一周”、李之藻序文中的“唐賈南皮畫寸分里”和“異人異書世不易邁”、歐洲大陸上葡萄牙國名“波爾杜瓦爾”，在日本摹繪本上分別被寫作“第八重二十八宿天七千年作一周”“元朱思本畫方分里”和“語不云乎在夷則進”“拂郎機”。此外，在日本摹繪本上，葡萄牙沿海有“拂郎機乃回回誤稱，本名波爾杜曷爾”註文，而此註文在現存的《坤輿萬國全圖》刻本上都是沒有的。¹⁹ 青木千枝子進而提出，1603年之後，李之藻在杭州根據利瑪竇新繪《兩儀玄覽圖》，對《坤輿萬國全圖》的部分版片進行了修訂；這個修訂版印刷出來的《坤輿萬國全圖》傳到日本後，被日本人所摹繪。因此，日本人的摹繪本，保存了《坤輿萬國全圖》李之藻杭州修訂版的特徵。²⁰

另一位在利瑪竇世界地圖研究中卓有成效的日本學者是海野一隆 (1921—2006)，他的主要成果，匯集在他於2003年出版的《東西地圖文化交流史研究》中。²¹ 不過，海野一隆的許多觀點，與青木千枝子並不相同。例如，對於日本摹繪本與《坤輿萬國全圖》刻本之間的差異，青木千枝子的結論是：這些差異，表明1603年之後李之藻曾在杭州對《坤輿萬國全圖》進行過修訂，日本人所摹繪的，正是李之藻的修訂本。而海野一隆卻認為，《坤輿萬

國全圖》於1602年7月在北京首次刊印出來後，有這樣幾個特點：“九重天圖”的文字是“第八重二十八宿天七千年作一周”，李之藻序文中有“元朱思本畫方分里”和“語不云乎在夷則進”這類的文字，葡萄牙被稱為“拂郎機”，同時在葡萄牙西側的大海上寫有“拂郎機乃回回誤稱，本名波爾杜曷爾”的註文。由於最初出版的《坤輿萬國全圖》很快傳入了日本，所以，日本人就以此為底本進行摹繪。海野一隆進而提出，稍後，李之藻和利瑪竇分別對《坤輿萬國全圖》的版子進行了兩次修改。第一次修改是李之藻進行的，修改的地方是：由於李之藻覺得將中國地圖學史從元代朱思本算起，時間太遲了，於是，把“元朱思本畫方分里”改為“唐賈南皮畫寸分里”，以顯示中國地圖學歷史之悠久；此外，李之藻還將自己序文中的“語不云乎在夷則進”改為“異人異書世不易邁”。第二次修改是利瑪竇進行的，主要是將“九重天圖”中的“第八重二十八宿天七千年作一周”改為“第八重二十八宿天四萬九千年作一周”，將對葡萄牙的稱呼“拂郎機”改為“波爾杜瓦爾”。而刻工們為了省事，則刪除了葡萄牙西側大海中“拂郎機乃回回誤稱，本名波爾杜曷爾”的註文。在海野一隆看來，世界上現存的明刻《坤輿萬國全圖》，實際上都是用第二次修改（利瑪竇修改）後的版子印刷出來的。²²

對於奧地利國家圖書館所藏《坤輿萬國全圖》，海野一隆與青木千枝子的觀點也不相同。青木千枝子指出，與李之藻原刻《坤輿萬國全圖》相比，奧地利國家圖書館藏本上面有許多差異。例如，李之藻原刻本上的“仙多默島”“仙衣力拿島”等，被寫成“聖多默島”和“聖衣力拿島”等；原刻本“四行論略曰：天主創作”中的“主”被誤刻成“生”；“畫長一百六十一日”被誤刻成“畫長一百六七日”；“總論橫度里分”中的“別有減分減秒”被誤刻成“別有咸分減秒”，等等。²³ 因此，在川村博忠看來，奧地利國家圖書館藏本是明代的刻工私刻本。青木千枝子則認為，這一藏本的版本是：明代刻工私刻版經過修復之後，到

中西交流

了清代又經過了首次修訂，包括將上面的“明”字改刻為“清”字。或者說，奧地利國家圖書館藏本上的“清”字是刻版上本來就有的。²⁴海野一隆的看法則是：奧地利國家圖書館藏本上本來只刻有“明”字，等印刷出來之後，人們才用毛筆將“明”字改為“清”字。也就是說，奧地利國家圖書館藏本並不能證明清代曾經出現過一副新的《坤輿萬國全圖》改刻版。²⁵海野一隆的這篇文章，既解決了一些老問題，又提出了一些新問題。這是他去世之前留給世人的珍貴學術遺產，值得認真閱讀。

利瑪竇的《坤輿萬國全圖》，除了1602年李之藻原刻版之外，還有彩繪本等。其中有一幅彩繪本，原先保存在韓國奉先寺。1918年，在朝鮮半島傳教的馬克·特洛勒普（Mark Trollope）神父曾撰文介紹過這幅地圖。²⁶1932年，這幅彩繪本《坤輿萬國全圖》曾在“朝鮮古地圖展”上展出過。遺憾的是，此圖後來下落不明。比較普遍的說法是，1951年奉先寺的一場大火燒毀了這幅珍貴的地圖。學者們為此深感遺憾。幸運的是，後來在韓國首爾大學奎章閣發現了一張《坤輿萬國全圖》照片。2001年，日本學者鈴木信昭對這張照片進行了研究，認為這幅照片所拍攝的，正是原先保存在奉先寺的那幅彩繪本《坤輿萬國全圖》。鈴木信昭進而認為，朝鮮肅宗三十四年（1708年），朝鮮官員在臨摹從中國傳來的彩繪本《坤輿萬國全圖》時，共摹繪了兩幅，其中原藏於奉先寺的那一幅（即只留下照片的那一幅）是正本，目前保存在韓國首爾大學博物館彩繪本《坤輿萬國全圖》則是副本；後來，朝鮮人又根據正本（原奉先寺藏本）繪製了另一幅彩繪本《坤輿萬國全圖》，該摹繪本目前保存在日本大阪南蠻文化館。而對於彩繪本《坤輿萬國全圖》的最初作者到底是利瑪竇，還是稍後的湯若望，鈴木信昭則無法確定。2003年，鈴木信昭的研究結論公開發表。²⁷

2002年，楊雨蕾在《韓國所見〈兩儀玄覽圖〉》一文中，通過實地查看韓國崇實大學基督教博物館藏《兩儀玄覽圖》，認為此藏本

與中國遼寧省博物館所藏《兩儀玄覽圖》“當為同一刻版印成”，但傳入朝鮮半島後，被人在朝鮮半島上用朱筆添加了“朝鮮”兩字。通過比較，楊雨蕾認為，遼寧省博物館藏本“缺失模糊不清的較多”，如“鶴島”“怕霧打島”等地名已經看不見了，但也有些地名，如“如漢島”“祈多”等，在韓國崇實大學基督教博物館藏本上模糊不清。因此，“若要進一步對《兩儀玄覽圖》進行研究，需兩本相互參照利用”。²⁸

2004年，黃時鑑、龔纓晏合作的《利瑪竇世界地圖》一書出版。本書全面總結了一個多世紀以來國內外學界關於利瑪竇世界地圖的研究成果，並將利瑪竇世界地圖上文字輯錄出來。該書出版後，受到了學術界的普遍好評。張西平在《百年利瑪竇研究》一文中說，這是“二十世紀後半葉利瑪竇研究的代表性著作”。²⁹2013年，米尼尼（Filippo Mignini）以《利瑪竇世界地圖研究》為基礎，用意大利文出版了《利瑪竇的地圖》（*La Cartografia de Matteo Ricci*）。³⁰

2008年12月2日，在香港舉辦的2008秋季拍賣會“中國古代書畫”專場拍賣會上，佳士得（香港）有限公司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新翼）拍賣出一幅“張文燾描利瑪竇《坤輿萬國全圖》”（英文名稱為*A 17th Century Print by Zhong Wentao after Matteo Ricci*），拍品編號1948，拍賣編號2620。該圖起初估價為港幣2,000,000—3,000,000元（折合259,341—389,012美元），最後成交價為港幣2,060,000元。³¹根據拍賣目錄上的圖片及介紹，這幅地圖應為李之藻原刻版。但是，佳士得並沒有說明這幅地圖的來源，也沒有說是誰最後拍得了這幅地圖。2009年，美國詹姆斯·福特·貝爾信託基金會（James Ford Bell Trust）從一位日本私人收藏者手中購得一幅利瑪竇繪製的《坤輿萬國全圖》。通過比較，可以發現，詹姆斯·福特·貝爾信託基金會所購入的《坤輿萬國全圖》，正是佳士得（香港）有限公司的那幅拍賣品。這幅地圖，

現存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的詹姆斯·福特·貝爾圖書館 (James Ford Bell Library, University of Minnesota)，並且經數字化後公佈在網上，供人們免費細覽。³² 2010年1月至4月，該地圖在美國國會圖書館 (Library of Congress, U.S.A.) 進行展出。美國國會圖書館還將此地圖進行了數字化，並公佈在網上，同樣免費供人使用。³³

2010年，劉明強發表文章，刊佈了他在《劉氏族譜》中發現的明人劉承範著《利瑪竇傳》(原題為《利瑪傳》)。劉承範，字洪卿，號陽華，湖北監利人，與利瑪竇有過多次交往。1589年，時任廣東韶州府同知的劉承範，造訪了位於廣東韶州的利瑪竇所建教堂，見到“精舍數間，所藏皆六經正學，子、史諸書。求其手自翻譯者，獨《大瀛全圖》耳。”³⁴ 根據劉承範的這篇《利瑪竇傳》，可以知道利瑪竇最早繪製的中文世界地圖名為《大瀛全圖》。但由於《大瀛全圖》之名僅見於劉承範的《利瑪竇傳》，而劉承範的這篇文章又是在1914年所修的家譜中找到的，所以這一孤證難以使學者們確定《大瀛全圖》之名是否可靠。後來，龔纓晏在寧波天一閣等地找到了明代鄞縣人徐時進所寫的《歐羅巴國記》一文。與利瑪竇曾有密切往來的徐時進在這篇文章中寫道，利瑪竇“以所攜《大瀛全圖》譯而視人”，從而證實了劉承範在《利瑪竇傳》中的記載。³⁵

2012年，日本京都大學的高田時雄發表了題為《俄藏利瑪竇〈世界地圖〉札記》的文章。這篇文章介紹了人們很少知道的俄羅斯所藏《坤輿萬國全圖》。高田時雄說，這幅《坤輿萬國全圖》收藏在位於俄國聖彼德堡的俄羅斯國家圖書館 (Российская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библиотека) 中，編號為ОР, Дорн770，六條屏幅保存較好，未經裝裱，也沒施色彩。高田時雄根據海野一隆的觀點，認為俄羅斯所藏《坤輿萬國全圖》也不是李之藻最初刻印出來的初版，而是用經過李之藻修改後的版子印刷出來的。高田時雄還以“狗國”為例，指出世界各地現存《坤輿萬國全圖》，並不是完全

是由同一個版片印刷出來的，而是由先後幾個不同的修訂版印刷而成的。³⁶

2012年，徐光台對《兩儀玄覽圖》的刊刻者李應試進行了專題研究。³⁷ 徐光台指出：李應試是世襲的錦衣衛官員，學識淵博，萬曆三十年(1602年)被利瑪竇說服，皈依天主教，“從時間上來看，李應試比‘聖教三柱石’徐光啟、李之藻與楊廷筠早受洗”。隨後，李應試將自己對天主教的熱忱延伸到利瑪竇繪製的世界地圖上，於萬曆三十一年(1603年)刊刻了利瑪竇的《兩儀玄覽圖》，這也是中國第一幅由天主教徒刊刻的世界地圖。這幅地圖的一大特色，就是首次在“十一重天圖”上明確標出了天堂的位置，並寫下了如下註文：“天主上帝發見天堂，諸神聖所居，永靜不動。”這樣，徐光台的文章，揭示了利瑪竇世界地圖在宗教學上的意義。

2013年，王永傑在文章中指出，利瑪竇世界地圖上的“女人國”就是古希臘時代廣為流傳的Amazones，而不是來自古代中國《山海經》等關於“女子國”之類的記載；“矮人國”也是來自西方文獻，而不是來自古代中國關於“小人國”“短人國”之類的記載，而且，“雖然中國文獻也有矮人與大鳥相鬥情節，但春季破壞鳥卵及利瑪竇所記騎羊之事唯常見於西方文獻”，“對矮人國的描述上，與奧特里烏斯、普蘭修相比，圖上有文字注記的墨卡托更可能為利瑪竇的參考對象”；“長人國”源自西文地圖及著作中所說的Patagones，而不是《太平廣記》等中國文獻。此外，王永傑還推測，“一目國”有可能是指希羅多德等人所記阿里馬斯比人(Αριμασποι)。³⁸

利瑪竇在晚年用意大利文所寫的回憶錄中，提到馮應京曾刊刻過獲自利瑪竇的*Doi Mappamondi Piccolo*。1936年，洪業將*Doi Mappamondi Piccolo*翻譯成《世界輿地二小圖》，並且認為，這兩小圖就是保存在明人程百二所編《方輿勝略》中的東西兩半球地圖。洪業的這個觀點，後來被學術界普遍

中西交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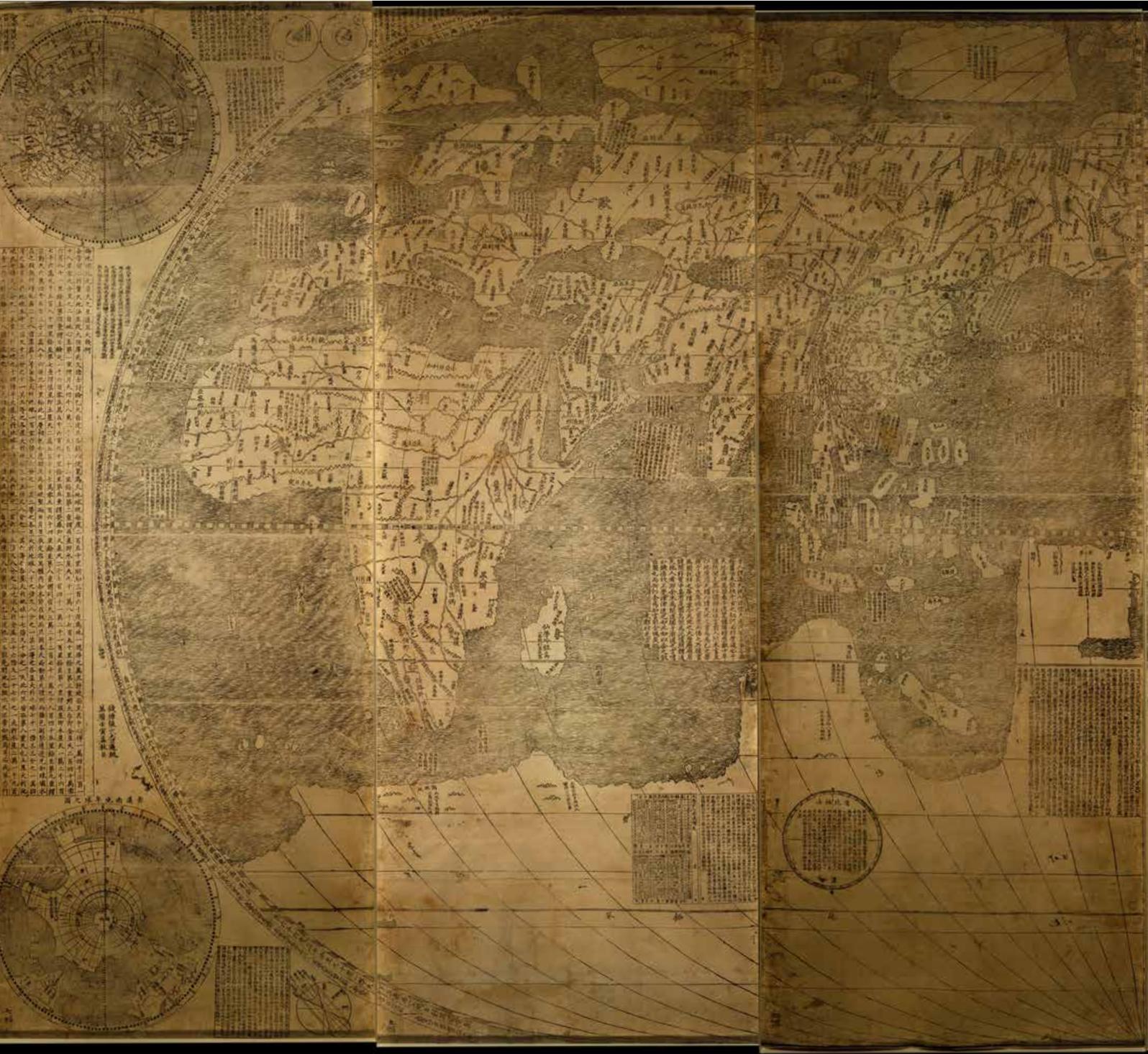




圖2. 明尼蘇達大學詹姆斯·福特·貝爾圖書館藏《坤輿萬國全圖》（美國國會圖書館掃描，圖片來源：www.loc.gov/item/2010585650/）

中西交流

採用。2014年，徐光台發表了《利瑪竇〈萬國二圖圖〉與馮應京印*Doi Mappamondi Piccolo*考》一文，推翻了這個觀點。徐光台指出，張京元在《題萬國小圖序》中明確寫道：利瑪竇“殫思竭力”，畫出了“可懸座右”的世界地圖“兩小圖”；張京元“與同門徐子先、姚仲含擊節稱善，共為捐俸，募善工刻之，遍貽海內”。因此，《萬國二圖圖》（程百二《方輿勝略》中的東西兩半球地圖是其摹本）實際上是張京元刊刻的，與馮應京無關。徐光台寫道：“《萬國二圖圖》約在萬曆三十五年九月刊刻，馮應京已在三十四年元月過世，因此它不可能是馮應京在世時刻印的*Doi Mappamondi Piccolo*”。³⁹那麼，由馮應京刊印的*Doi Mappamondi Piccolo*是甚麼樣的地圖呢？徐光台認為，這個*Doi Mappamondi Piccolo*就是收錄在《月令廣義》中的“天地儀”圖和“九重天圖”。2016年，宋黎明對徐光台的觀點提出了質疑，認為利瑪竇所說的*Doi Mappamondi Piccolo*“既非馮應京《月令廣義》所載《九重天圖》和《天地儀》，亦非其中的《山海輿地全圖》，而是利瑪竇繪製、張京元刊刻的《萬國二圖圖》，利瑪竇將刊刻者張京元誤記為馮應京。”⁴⁰對此，徐光台專門作了答覆，並且寫道：“雖然利瑪竇筆下的*Doi Mappamondi Piccolo*是個小題，筆者先前的論文將*Doi Mappamondi Piccolo*與《萬國二圖圖》脫鉤，從馮應京文獻的脈絡推論出一個新的解答。宋先生反將利瑪竇筆下馮應京印*Doi Mappamondi Piccolo*與《萬國二圖圖》又綁在一起，主要的論述在關鍵處不是誤讀史料或混淆史料編纂，就是僅憑個人臆測，假設利瑪竇記載有誤，提出‘張冠馮戴’說，走的不像是史學研究的正途，亦未就論述的關鍵處帶來新的歷史知識。”⁴¹

如前所述，韓國奉先寺收藏的彩繪本《坤輿萬國全圖》雖然已經失傳了，但其照片卻保存在韓國首爾大學的奎章閣中。2014年，楊雨蕾探討了彩繪本《坤輿萬國全圖》以下三個藏本之間的關係：韓國首爾大學博物館藏本，

韓國奉先寺藏本，日本北村芳郎藏本。楊雨蕾認為，彩繪本《坤輿萬國全圖》傳入朝鮮半島後，朝鮮王朝組織力量於1708年8月和9月進行了兩次摹繪。第一次摹繪出來的就是首爾大學博物館藏本。但這個摹繪本，“與傳入朝鮮半島的母本多有出入，王朝政府不甚滿意，所以才進行第二次摹繪工作，以求與母本更為接近。”第二次摹繪出來的，就是奉先寺藏本。這樣，“奉先寺藏本應當與傳入的母本更為接近”。而北村芳郎藏本則可能是根據奉先寺藏本摹繪而成的，因此，這兩個藏本比較接近，例如，“兩圖均存有耶穌會士的三枚印章，而首爾大學博物館藏本無”。楊雨蕾認為，彩繪本《坤輿萬國全圖》可以分為兩個系列，一個是南京博物院藏本系列，另一個就是朝鮮彩繪本系列，而且，“相比於南京博物館藏本系列，朝鮮彩繪本似乎更接近於以梵蒂岡藏本I為代表的《坤輿萬國全圖》木刻本原圖”。楊雨蕾進一步提出，“南京博物館藏本系列和朝鮮彩繪本所依據的直接母本應該不同，當然這兩個直接母本必定也都源出於一個更早的共同母本，即最初的彩繪本原本”，而這個“最初的原本最有可能還是西方傳教士的手筆”。⁴²

楊雨蕾在文章中說，她所說的南京博物館藏本系列包括以下幾種藏本：南京博物館藏本、理格藏本、美國凱達爾捕鯨博物館藏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本。在這幾幅藏本中，學者們一直以為，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本從未公佈過，並深以為憾。2014年5月，第一屆“全球地圖中的澳門”國際會議在澳門科技大學召開。龔纓晏在會上發表的《關於彩繪本〈坤輿萬國全圖〉的幾個問題》一文中指出，在曹婉如等人主編的《中國古代地圖集（明代）》（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年）中，編號為圖版78、79的兩幅地圖，實際上就是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本，只不過此書的編纂者誤將這兩幅地圖當成了南京博物院藏本。⁴³

2015年，高翔出版了《〈坤輿萬國全圖〉地名考本》一書。作者以嚴謹的態度，充分利用了所能掌握的所有中外文資料，對《坤輿萬

國全圖》上的近1,200個地名進行了逐一考證，希望能夠通過追根溯源的方式，澄清《坤輿萬國全圖》上所有地名的來源。在研究條件不太理想的情況下，能夠寫出這樣一本書，實在是非常不容易的。書中提出的一些觀點，也是很有見地的。⁴⁴

在2015年所發表的關於利瑪竇世界地圖的文章中，最為重要的當推湯開建和周孝雷的《明代利瑪竇世界地圖傳播史四題》。⁴⁵這篇力作，通過發掘前所未知的中文史料，修正了學術界流行的許多錯誤說法，重新構建了利瑪竇世界地圖的繪製過程。湯開建在文章中論證說：利瑪竇所繪第一幅中文世界地圖的名稱應為《大瀛全圖》；趙可懷雖將《大瀛全圖》勒石於蘇州，但將地圖命名為《山海輿地圖》；吳中明是在1598年刊印了《山海輿地全圖》，而不是在1600年；程百二《方輿勝略》所收錄的兩幅小型世界地圖，是泰興人張京元刊刻的，而不是馮應京。湯開建的這篇文章，將利瑪竇世界地圖的研究推進到一個新的高度。

2016年10月，美國拍賣市場上推出了一件編號為6084的收藏品，由於被誤認為是“兩幅十九世紀的日本印刷品”（*Two 19th C. Japanese Prints*），所以開價也很低。美國古董商魯德曼（Barry Ruderman）購得這一拍賣品後，認為它極有可能是明朝萬曆皇帝委託利瑪竇繪製的世界地圖，從而引起了公眾及學者的深厚興趣。這一拍賣品，實際上是一幅彩繪本《坤輿萬國全圖》的殘件，分別是第一條和最後一條（第六條）屏幅。龔纓晏將這幅彩繪本《坤輿萬國全圖》殘件稱為“6084號殘圖”，並且發現，在第二條屏幅上方的北半球地圖中，中國東面的大海中標有“大明海”三個字，而在中國的大陸部分，則有“大清一統”四個字。因此，可以確定，這幅彩繪本《坤輿萬國全圖》最初是在明代繪製的，清朝建立後被人進行了修改。⁴⁶

與二十世紀相比，二十一世紀利瑪竇世界地圖研究的一個顯著特點是，現代科技發揮了

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二十世紀，主要利用照相技術將利瑪竇世界地圖拍成照片或印在紙上，圖像質量不高，特別是難以看清細節，傳播的範圍也受到了限制。進入二十一世紀，越來越多的高清版利瑪竇世界地圖藉助國際互聯網而得以在全球範圍內快速傳播，從而為研究者提供了豐富的資料。在日本京都大學、日本宮城縣立圖書館、美國國會圖書館、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的詹姆斯·福特·貝爾圖書館的網頁上，都可以看到免費的高清版利瑪竇世界地圖。此外，與利瑪竇世界地圖相關的大量西文地圖，也可以在國際互聯網上找到。這就為深入研究利瑪竇世界地圖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這裡，還需要提到的是荷蘭學者馬塞爾·范登·布羅（Marcel van den Broecke）的研究成果。在二十多年裡，馬塞爾·范登·布羅一直專注於對奧特里烏斯《地球大觀》的研究，並於1996年出版了《奧特里烏斯世界地圖集指南》（*Ortelius Atlas Maps: An Illustrated Guide*），2011年又出版了修訂版。雖然這本著作與利瑪竇世界地圖沒有直接的關係，但由於利瑪竇中文世界地圖主要是依據奧特里烏斯的《地球大觀》，所以，《奧特里烏斯世界地圖集指南》對於探討利瑪竇世界地圖的西文資料來源具有重要價值。此外，馬塞爾·范登·布羅還建立了關於奧特里烏斯的一個專門網站，給研究者帶來了很大的便利。⁴⁷我們知道，奧特里烏斯的《地球大觀》經過了多次的修訂，其中有些地圖還被徹底重繪。這樣，如果要知道利瑪竇世界地圖中的某個地名是否來自奧特里烏斯的《地球大觀》，就必須掌握《地球大觀》的所有版本，否則就會得出錯誤的結論。而《奧特里烏斯世界地圖集指南》正是蒐集了《地球大觀》所有版本，這就為考證利瑪竇世界地圖與奧特里烏斯《地球大觀》之間的關係奠定了扎實的基礎。

回顧一個多世紀以來國內外學者對利瑪竇世界地圖的研究歷程，可以得出這樣幾個結論：

第一，對利瑪竇世界地圖的研究，最先是

中西交流

由西方學者發起的，並且進行了一系列開創性的研究。他們藉助自己在利用西文原始資料上的優勢，長期主導了這個學術領域。

第二，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日本和中國的學者開始參與對利瑪竇世界地圖的研究，並且通過發掘中文史料，解決了不少學術難題，為相關研究做出了自己的貢獻。隨後，日本學者的相關研究不斷深化、細化，研究領域也日益擴大，包括：利瑪竇世界地圖的繪製過程，利瑪竇世界地圖在日本的收藏、流傳及影響，日本人摹繪的利瑪竇世界地圖，世界各地現存利瑪竇世界地圖的比較研究，等等。這樣，自二十世紀中期開始，日本學者就和西方學者一起，共同構成了推動這項研究的兩大力量。

第三，與此相反，進入二十世紀中期之後，中國學者在利瑪竇的研究上（包括對利氏世界地圖的研究），則長期處於停滯甚至倒退的狀態，對國外的學術動態所知極少。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開始，中國學術界對利瑪竇世界地圖的研究開始復甦，並且快速興起。進入二十一世紀，中國學者的成果日益豐碩，越來越受到了國際學術界的重視。完全可以說，今天，在對利瑪竇世界地圖的研究中，已形成中國學者、日本學者、西方學者三足鼎立之勢。

第四，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國的利瑪竇研究（包括利氏世界地圖研究）中，澳門發揮了重要作用，主要表現為：澳門各類學術文化機構以多種形式持續高強度地資助此項研究；澳門各類學術文化機構幾乎每年都舉辦相關的學術研討會，從而為國內外學術信息的交流創造了良好的條件；許多重要研究成果都是在澳門出版的。

第五，在對利瑪竇世界地圖的研究中，有兩大推動力量。一是地圖本身（包括刻本及各種摹繪本）的發現。二是中外文新史料的發現。當然，要發現新的利瑪竇地圖（包括刻本和摹本），具有很大偶然性，可以說是一件可遇而不可求的事。而要發現新的中外文史料，還是

可能通過主觀努力去實現的。因此，今後還是要繼續重視中外文原始資料的發掘，特別是海外文獻的搜集與整理。

經過國際學術界一百多年的努力，對利瑪竇世界地圖的研究已經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不再停留在簡單、宏觀、粗疏的層次上，而是達到了較高的學術水平。目前在利瑪竇世界地圖研究中所面臨的問題，都是難度較大、較為複雜的問題。要解決這些難題，今後需要特別加強以下兩個方面的工作。第一，世界各地已經發現的利瑪竇世界地圖刻本及摹本（例如遼寧省博物館所藏《兩儀玄覽圖》、南京博物院所藏彩繪本《坤輿萬國全圖》、韓國崇實大學基督教博物館所藏《兩儀玄覽圖》、英國皇家地理學會所藏《坤輿萬國全圖》、奧地利國家圖書館所藏《坤輿萬國全圖》等），需要完整、清晰地公佈出來，供各國學者共同研究。第二，需要通過探討具體細節來推進此項研究，例如版子的修訂情況，地圖上各類註文的差異，每個地名的具體來源，等等。我們期待着隨着社會的不斷進步，這兩個方面在不遠的將來都會取得重要進展。

作者附記：本文為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2016年學術研究獎學金項目“利瑪竇世界地圖考論”階段性成果。

註釋：

1. Henry Yule, "The Atlas Sinensis and other Sinensiana", *Geographical Magazine*, 1874, 1st July, pp. 147-148.
2. [日]青楓生：《利瑪竇の地圖について簡明なる説明》，《歷史地理》1905年第1號，第56-65頁；《利瑪竇の地圖説明について第一回の補遺》，《歷史地理》1905年第2號，第69-72頁。
3. Leo Bagrow, *History of Cartography*, Chicago: Precedent Publishing, 1985, p. 202.
4. 黃時鑑：《艾儒略〈萬國全圖〉A、B本見讀後記》，《黃時鑑全集III：東海西海——東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中西

- 書局：2011年，第273-280頁。
5. J. F. Baddeley, "Father Matteo Ricci's Chinese World-Map, 1584-1603",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 50, no. 4, 1917, pp. 254-270.
 6. E. Heawood, "The Relationships of the Ricci Maps",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 50, No. 4, 1917, pp. 271-276.
 7. Lionel Giles, "Translations from the Chinese World Map of Father Ricci",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 52, No. 6, 1918, pp. 367-385;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 53, No. 1, 1919, pp. 19-30.
 8. [日] 鮎沢信太郎：《利瑪竇の世界地圖に就いて》，《地球》1936年第26卷第4期，第261-277頁。
 9. 楊雨蕾：《韓國所見〈兩儀玄覽圖〉》，《文獻》2020年第4期，第273-280頁。
 10. 金良善：《明末清初耶穌會宣教師製作的世界地圖》，載金良善《梅山國學散稿》，漢城：崇田大學校博物館，1972年，第186-189頁。
 11. 方豪：《梵蒂岡出版利瑪竇“坤輿萬國全圖”讀後記》，載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下冊，台北：學生書局，1969年，第898-901頁。
 12. [韓] 盧禎植：《〈芝峰類說〉地理學內容的研究》，《大邱教育大學論文集》1969年第4號，第131-147頁。
 13. 張寶雄：《關於利瑪竇的世界地圖研究》，《東國史學》1976年第13期，第85-202頁。
 14. 張寶雄：《關於利瑪竇的世界地圖研究》，《東國史學》1976年第13期，第85-202頁。
 15. 曹婉如、薄樹人等：《中國現存利瑪竇世界地圖的研究》，《文物》1983年第12期，第57-70頁。
 16. Minako Debergh, "La carte du monde de P. Matteo Ricci (1602) et sa version coréenne (1708) conservée à Osaka", *Journal Asiatique*, Tome, 274, 1986, pp. 417-454.
 17. [日] 川村博忠：《オーストリア国立図書館所蔵のマテオ・リッチ世界図〈坤輿万国全図〉》，《人文地理》1988年第5號，第403-423頁。
 18. John Day, "The Search for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Manuscript of Matteo Ricci's Maps", *Imago Mundi*, Vol. 47, 1995, pp. 94-117.
 19. [日] 青木千枝子：《わが国における〈坤輿万国全図〉模写図の諸問題について》，《人文地理》1991年第5號，第508-509頁。
 20. [日] 青木千枝子：《我が国に現存する〈坤輿万国全図〉の刊本に関する一考察》，《汲古》1993年第23號，第107-113頁。
 21. [日] 海野一隆：《東西地図文化交渉史研究》，大阪：清文堂，2003年。
 22. [日] 海野一隆：《利瑪竇〈坤輿万国全図〉の諸版》，《東洋學報》2005年第1期，第101-143頁。
 23. [日] 青木千枝子：《オーストリア国立図書館所蔵の〈坤輿万国全図〉について》，《汲古》1994年第25號，第52-57頁。
 24. [日] 河野通博：《青木千枝子さんの〈坤輿万国全図〉研究》，《地理》1998年第12期，第84-90頁。
 25. [日] 海野一隆：《利瑪竇〈坤輿万国全図〉の諸版》，《東洋學報》2005年第1期，第101-143頁。
 26. Mark Trollope, "Another Jesuit World-Map Made in China",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 53, No. 2, 1919, pp. 124-125.
 27. [日] 鈴木信昭：《朝鮮肅宗三十四年描画入り〈坤輿万国全図〉攷》，《史苑》2003年第二號，第6-35頁。
 28. 楊雨蕾：《韓國所見〈兩儀玄覽圖〉》，《文獻》2020年第4期，第273-280頁。
 29. 張西平在《百年利瑪竇研究》一文中說，這是“二十世紀後半葉利瑪竇研究的代表性著作”。《世界宗教研究》2010年第3期，第69-76頁。
 30. Filippo Mignini, *La Cartografia de Matteo Ricci*, Roma: Libreria Dello Stato, 2013.
 31. 見佳士得官網 <http://www.christies.com/>，以及 <http://auction.artxun.com/paimai-29907-149530069.shtml>
 32. 網址：<https://www.lib.umn.edu/bell/riccimap>
 33. 網址：<https://www.loc.gov/item/2010585650/>
 34. 劉明強：《萬曆韶州同知劉承範及其〈利瑪竇傳〉》，《韶關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11期，第1-8頁。黎玉琴、劉明強：《利瑪竇史海鉤沉一則》，《肇慶學院學報》2011年第4期，第1-5頁。
 35. 龔纓晏：《〈歐羅巴國記〉：古代中國最早介紹歐洲的著述》，《社會科學戰線》2015年第11期，第80-89頁。
 36. [日] 高田時雄：《俄藏利瑪竇〈世界地圖〉札記》，載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編《輿地、考古與史學新說》，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第593-604頁。該文第602頁上的三次印刷次序大概誤印了。這裡所述三次印刷次序，是根據高田時雄這篇文章的正文及插圖歸納出來的。
 37. 徐光台：《利瑪竇、李應試與〈兩儀玄覽圖〉》，《漢學研究》2012年第4期，第133-167頁。
 38. 王永傑：《利瑪竇、艾儒略世界地圖所記幾則傳說考辨》，《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13年第3輯，第124-141頁。
 39. 徐光台：《利瑪竇〈萬國二圓圖〉與馮應京印“Doi Mappamondi Piccoli”考》，《漢學研究》2014年第3期，第287-310頁。
 40. 宋黎明：《利瑪竇筆下“Doi Mappamondi Piccoli”即〈萬國二圓圖〉——與徐光台教授商榷》，《漢學研究》2015年第4期，第299-317頁。
 41. 徐光台：《對宋黎明先生〈利瑪竇筆下“Doi Mappamondi

中西交流

Piccoli”即《萬國二圖圖》——與徐光台教授商榷的回應》，《漢學研究》2016年第4期，第319-322頁。

42. 楊雨蕾：《〈坤輿萬國全圖〉朝鮮彩色摹繪本及相關問題》，《歷史地理》2014年第29輯，第336-343頁。
43. 龔纓晏：《關於彩繪本〈坤輿萬國全圖〉的幾個問題》，載張曙光、戴隆基主編《駛向東方：全球地圖中的澳門（第一卷·

中英雙語版）》，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第223-239頁。

44. 高翔：《〈坤輿萬國全圖〉地名考本》，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15年，第193頁。
45. 湯開建、周孝雷：《明代利瑪竇世界地圖傳播史四題》，《自然科學史研究》2015年第3期，第294-315頁。
46. 龔纓晏、梁傑龍：《新發現的〈坤輿萬國全圖〉及其學術價值》，《海交史研究》2017年第1期，第1-13頁。
47. <http://www.orteliusmaps.com/>



